

在AI写作引发争议的当下,作家郝景芳公开说,她的《银河学院》里“AI写作的比重已经可以占到一半了”,此言一出,迅即冲上热搜。近日,她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采访——

# AI只提供“菜市场”,“做菜”还得靠人

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李娇娇

人们熟知郝景芳,大多是从“第74届雨果奖得主”这一身份开始的。但郝景芳曾多次在媒体采访中表示,她从来不愿被单一标签定义。从早年的现实主义长篇《生于一九八四》、散文集《时光里的欧洲》,到2017年创办儿童通识教育品牌“童行书院”,她的创作逐渐向少儿科幻延伸。

2025年,她推出少儿科幻系列作品《银河学院》,目前已推出五册,以小学生凌小步的冒险经历为主线,将她多年沉淀的教育理念融入故事之中。而真正让《银河学院》跳出童书圈、引爆全网讨论的,是三个月前的一场风波。今年6月,她在一次活动中提到,《银河学院》里“AI写作的比重已经可以占到一半了”。消息一出,随即冲上热搜。

舆论场中很快出现“背叛原创”“透支文学信任”的质疑,有读者直言感受到被欺骗。面对争议,郝景芳回应:所谓50%,不是指AI写了半个故事,而是在她拆分出的30多个创作环节中,AI承担了背景调研、灵感激发、细节打磨等辅助工作,但核心构思、情感表达与最终定稿均由她本人完成。她还“手搓”了一套AI写作辅助系统,将其作为提升创作效率的工作台。

近日,由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主办的“粤派批评”系列活动“AI写作,边界何在”郝景芳新书分享会在广州扶光书店举办。活动结束后,郝景芳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采访。

## AI“参与”写作不等于AI替代写作

羊城晚报:距离获得雨果奖已经过去十年,您怎么描述近几年来在写作上发生的变化?

郝景芳:我从创业之初就开始写儿童科幻了,今年已经走到第九年。这些年我一直在“传递正确的知识与价值观”和“贴合孩子的兴趣与天性”之间来回调试,想找最舒服的平衡点。从最早的音频课程,到后来的通识教育游戏化APP,走过这两个阶段,我萌生了一个新想法:能不能为孩子写一套他们真正爱读的书?直到去年,《银河学院》第一套和读者见面,今年又推出了第二套。只要孩子喜欢,我会一直写下去。我始终想做的,就是既有实实在在的成长价值,又真正被孩子发自内心的喜欢的内容。

羊城晚报:一边是传统科幻,一边是少儿科幻,这两条创作线是并行推进的吗?

郝景芳:和《银河学院》一样,我最近的长篇《折叠宇宙:吞噬文明》也打算写成系列,都是比较宏大的计划。忙完工作后,我会留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写作——比如专门写两三周,再忙一整段别的工作,然后再安排两三周。写作时间必须完整,我没办法把它切碎。

羊城晚报:这三周里,一般能写多少?

郝景芳:像《银河学院》这样一套书,一本大概五六万字。以前不借助AI,我可能要写两个多月;现在借助AI,可以压缩到大概三周就写完一本。AI能在很多环节帮忙加速,以前每个环节可能都要花好几天,现在每个环节都能快速往下推,写作效率大大提升。

羊城晚报:今年6月,您提到《银河学院》中“AI写作的比重已经可以占到

一半了”,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。您想过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吗?

郝景芳:登上热搜之后我反倒想,接下来我可能会很高调地去做AI创意写作的宣传和培训。我不想让大家误解“AI参与写作”,认为“AI参与写作”就是AI替代写作、就是“人不写了”。其实AI参与写作,只是让它参与进来。我甚至计划在微博上做一系列宣传,讲怎么让AI帮作者把作品写得更好,弥补他本身的不足,也加快速度。AI本身就是一个工具,它的作用就像你徒步还是开车一样——你的作品才是你最终抵达的地方,有一个代步工具能让你走得又快又好,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应该的。

羊城晚报:您觉得这种坦率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,还是不必要的?

郝景芳:我觉得你接受也可以,不接受也可以。这就像你选择吃辣还是不吃辣,没什么可争的。我也尊重其他人的意见,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。

## AI能细化创意,但无法取代人的判断力

羊城晚报:能否用一个具体场景解释AI参与写作的过程?

郝景芳:以前在故事里设计一个道具,可能要花费我一天的时间。现在我会让AI出几个主意,比如让它生成十个能在主角逃生时起到关键作用的道具,然后我从其中挑选出我认为不错的。比如写达尔文环球航行,达尔文和船员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坐什么船,换成以前我要花两天才能最终确定。现在我都会让AI先查资料、拟初稿,再核对事实、挑出能用的部分,剩下的文学性部分我自己串联。在我的写作当中,文学性的部分大概占用20%的时间,剩下80%的时间都用于敲定情节、道具等细节。

羊城晚报:这里可能涉及两个方

面。一是资料查阅,比如道具的年代、构成及历史背景;另一方面则是创意的部分。如果写作者连道具本身的概念也未形成,就直接从AI生成的结果中选取,那么AI的创意是否高于人本身?

郝景芳:AI给你列了十个道具,你就用这十个吗?判断力是人的,审美是人的,把AI的建议变成你自己想的、自己延伸思考出来的东西,这些都是人做的。

以前没有AI提示的时候,写作者也是千方百计去找提示:翻书、上网,或者停下来等灵感。现在AI能随时随地提供灵感启发,作者可能在AI的刺激下很快有了新想法,无论是情节的推进,还是故事里的道具。AI还能“细化”——创意来自作者本人,但AI可以把创意展开,而在展开的过程中,作者也会把内容想得更清楚。

羊城晚报:在您看来,对于人机合作来说,有哪些方面是AI不能取代作者本人的?创作者必须做到哪一步,才有真正的原创性可言?

郝景芳:创作过程中的每一步,只要需要判断力的,它都不能帮你。我常说AI就是“卖菜的”,它给你提供一个菜市场,你自己定菜谱,它还帮你把菜炒一炒。选什么原材料、做什么菜、怎么做、最后做出来是什么菜,每一步都必须是人做的。没有AI的时候,你还得自己去地里种;现在AI给了你一整整个菜市场,你随便挑。想做西红柿炒鸡蛋,以前全靠自己洗、自己切,现在它帮你把西红柿切好了,你来指挥它。但最后到底要做什么菜,没有人能替代你。

羊城晚报:AI不能代替写作者来进行判断、决策。

郝景芳:是的。所有关于对话的情节,我都是自己码字的。因为AI特别“直”,它只能按照对话里两个人的最终意图顺着往下写。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并非如此:比如两个人吵架,彼此都在内心里希望跟对方和好,但最后说出来的可能是互相伤害的话——这才是

人真实的情感。所以AI能否取代人来写作,关键在于写作者本身是否对“想写什么”有足够清晰的认知,以及对AI生成的文字质量过不过关的判断力。判断力是最重要的。

## 真正的争议应是作品质量本身

羊城晚报:写作是很私密的过程,它是内在的。所以当读者或出版社编辑拿到一部著作时,往往很难判断写作者究竟是否用了AI帮忙。

郝景芳:我认为这涉及三个标准。第一是完成度,即作品本身是否完整;第二是质量和文学性;第三是有没有涉及抄袭。是否使用AI不应该成为争议,真正的争议应是作品质量本身——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,评判标准不能下降。因此,我不认为出版社应该出版文学性不高的纯手写作品,而去拒绝一个借助了AI、但文学性高的作品。我一直想做个“图灵测试”,在完全不标注是否使用AI的情况下,让读者们在阅读作品后进行“盲选”,最后看看究竟是纯手写的作品写得好,还是使用了AI的作品写得好。

羊城晚报:您曾提到自己搭建了数据语料库,只用自己的文字来投喂、训练AI,但如果模型本身也涉及大数据和其他语料,并不能算是“自己的文字”。

郝景芳:大模型是一种算法,我不可能自己去搭建。再说了,人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,也不是完全基于自身的努力。我看了海明威、大仲马和马尔扎克的作品,也看了《简·爱》《红楼梦》,我把这些作品装进脑子里,再创作出一本新书,这难道不是我的原创吗?我读了一千本书再写一本新书,这是原创;AI读了一万本书再写一本新书,就不是原创?我认为这是“双标”。原创不原创,取决于你写出来的作品和已有的其他

作品存在相似度多少,而不取决于它“学”了多少。

羊城晚报:现在影视行业已率先使用了AI标注,一些短视频平台要求使用了AI技术的影片添加水印,您认为在写作领域是否有这样的必要?

郝景芳:我觉得可以标,这无所谓。但你会发现标了也没用——现在AI漫剧的赛道就是比真人影视剧赛道火,大家该看还是看,并不会因为你标了就歧视你。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发展:原来真人剧就是真人拍,AI剧就是用AI建模去做,现在更多是真人和AI的协作模式,主角只需要拍摄几场重要情节,其余场次可以通过AI生成。这是技术进步的体现。依然是那句话:受众可能并不关心这部剧有没有用AI,他们更关心这部剧好不好看。

羊城晚报:当有读者发现自己花费成本购买的读物大量由AI生成时,难免会产生与阅读预期不符的落差?

郝景芳:我始终保持两个态度:其一,我十分尊重传统纸质出版行业,也一直愿意以纸质书的形式推出作品;其二,我不认为纸张成本、传统出版流程这类因素,能够成为阻碍时代发展的壁垒。时代本就该与时俱进向前走,部分内容载体的形式发生改变,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就像今天我们不必人人都去写五言绝句——五言绝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形态,但如果认定只有五言绝句才配称为文学巅峰,我们大概会错过后续同样精彩的新文学表达。

羊城晚报:接下来您最想写的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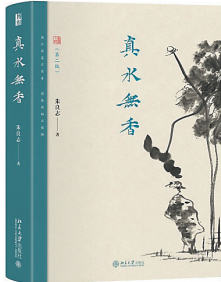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?郝景芳:我一直想写一部现实主义、不带科幻的作品。最近这十年,我一直在做创业,也跟着这个时代经历了起起伏伏,认识了一些创业者、投资人和家长,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。但完全基于当下现实,不带任何虚构成分的作品,往往是最难写的,所以这是我比较长期的写作计划。



郝景芳 陈杰伟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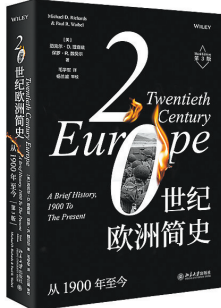
## 出版书单

《真水无香》  
朱良志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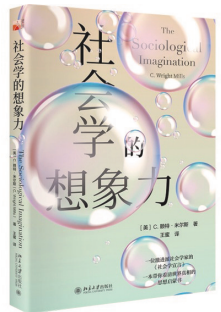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通过对中国艺术和审美生活的考察,突出师法造化、逃避人工秩序是中国艺术的根本法则。围绕这个中心,全书分列若干专题——诗、书、画、印、瓷、石、盆景,等等,拈出若干范畴,如荒寒、苍古、朴拙等,对中国艺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究,倡导以自然本真淳朴为美的传统审美观。

《20世纪欧洲简史：从1900年至今》  
迈克·D·理查兹[美] 保罗·R·魏贝尔[美]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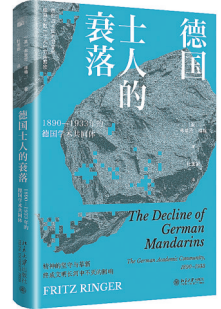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通过讲述欧洲一个世纪来的曲折发展历程,展现了欧洲文明的一体两面:美好与丑陋,光明与黑暗,文明与野蛮,蜕变与新生,在引领读者感受欧洲的磨难和成长的同时,勾勒出一幅欧洲历史嬗变的百年画卷。

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  
赖特·米尔斯[美] 著



本书通过批判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,提出自己对“社会学家应该如何想象”这个核心问题的看法,认为社会学家有责任向社会大众阐释清楚:他们的私人困扰并非只是个人命运问题,而是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,社会结构若不发生真正改变,困扰私人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。

《德国士人的衰落》  
弗里茨·林格[美] 著



本书讲述1890—1933年间,德国一群以大学教授为核心的读书人精英——作者称之为“士人”——在工业化、大众化的时代浪潮中,如何守护理想、回应剧变的故事。

《当代文学的思想地形图》  
刘复生 著



本书点面结合,包括四个专题,涉及革命乡土文学、伤痕文学、先锋小说、历史小说、都市小说等重要创作现象,勾勒当代思想文化的地形图,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多重场域中的生成与演变。

## 洞见 口汤红

张求会教授的《陈寅恪四书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),以严谨的实证考据、克制中立的学术立场与批判性的学术史视野引发学界和读书界关注,在广泛赞誉的同时也伴随着商榷意见,客观呈现了当下陈学研究的真实生态。

长期以来,陈寅恪研究普遍存在重精神阐释轻史实考证、重符号塑造轻文本细读的倾向。自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广为传播后,陈寅恪逐渐被塑造成坚守独立精神的文化符号。大量研究偏重品格颂扬与价值拔高,对生平细节、交游史实、文献真伪疏于精审考辨,诸多传闻附会、主观臆断的叙事层层累积,形成固化的认知迷雾,制约了陈学研究的精准化。

《陈寅恪四书》最核心的学术价值,便是以实证史学为本位,对既往传奇化的陈寅恪叙事完成系统性祛魅。全书恪守无征不书、无证不言的考据准则,依托一手材料,厘清了不少学界长期争议的疑难史实。第一册《徐生流转》聚焦陈寅恪岭南岁月,针对其1949年去留抉择、晚年授课实况、各类軼事典故等问题逐一勘误纠偏。全书摒弃抒情化叙事与悲情化塑造,以史料还原真

## 祛魅与求真:《陈寅恪四书》的贡献与争议

实、立体、置身具体时代境遇的名人形象,破除文学化、脸谱化叙事积弊,为陈学研究夯实了事实根基。

文献辑佚与文本校勘,是该书广受专业人士认可的核心亮点。通行版陈寅恪全集存在文本不全、零星文献散佚等问题,大量序跋、书信等珍贵文献长期湮没,致使学界对陈氏治学脉络与思想细节的认知存在诸多空白。第三册《世外文章》专事陈氏集外佚文的系统钩沉、甄别校订,在文献辑录之外,辅以版本溯源、文字校勘与语境考证,极大完善了陈寅恪的文献体系。一年半以来,这批新整理的原始文献已被诸多中青年研究者援引采信,充分印证了该书的基础性文献价值,为后续陈学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全新文本支撑。

在研究方法层面,第二册《古调犹弹》构建的同辈日记互证研究范式,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创新。传统学人研究多采用单一传记叙事模式,以传主个人经历为唯一主线,视角局限、语境单薄。该书突破固有框架,选取六位同代学人的日记为核心史料,以多元旁观者视角重构同时代全国文史界与岭南学术生态。通过交叉互证,细致还原陈寅恪日

常治学、人际往来的真实细节,弥补了单一史料的片面性。这种以同时代原始文献互证还原学人处境的研究路径,既丰富了陈寅恪研究的维度,也为学界同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学范式。

全书最具锋芒、最具革新意义的部分,当属第四册《尔尔区区》对陈学的系统性学术史复盘与批评。陈学研究成果浩繁,但整体质量参差不齐。不少研究脱离史料空谈义理、过度阐释,部分早期“经典”的史实疏漏与解读偏差,因传播广泛而被奉为定论,形成顽固的学术惯性谬误。张求会立足三十年研究积累,对代表性陈学成果开展细致公允的评议。其批评完全立足史料比对与史实考证,既客观肯定开拓之功,亦直面史料缺陷、解读偏差与叙事误区。这一写作打破了陈学研究长期只颂扬不商榷、只承袭不反思的封闭格局。在当下学界多回避学术争议、趋向同质化言说的背景下,这种求真务实、基于实证的批判性学术书写,足以推动该领域从符号化的价值颂扬转向精细化、理性化的学术反思。

尤为难得的是,《陈寅恪四书》展现出高度自觉的学术边界意识。作者清

晰界定自身研究范畴,始终聚焦陈氏生平史实、人际交游、文献整理、研究史梳理,刻意回避对其中古史学理体系、诗史互证理论、钱锺因缘阐释等核心内容的过度解读与强行拔高。这种守本分、不越界的克制治学姿态,摒弃了空泛阐释、过度生发的常见弊病,让全书所有结论扎实稳妥、有据可依,堪称当下文史研究自律治学的范例。

在公共传播与地域学术脉络上,此书亦有独特价值。该书接续陈寅恪晚年寓居岭南的学术脉络,是华南区域近年文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。行文兼顾专业考据与可读性,既可供专业研究者查阅考证,也能帮助普通读者跳出网络碎片化的符号叙事,重新认识陈寅恪,实现了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的平衡。

当然,面世一年半以来,学界在充分肯定其贡献之余,也提出若干审慎的商榷意见。其一,研究范畴存在天然边界。本书重心在生平与文献考据,并未深入阐释陈寅恪史学思想与史学成就,不能将其视作陈氏学术思想通论。其二,以同辈日记为核心史料,自有其限度。日记带有主观立场,存在观察与记忆偏差,依靠日记所得结论仍有待更多

